

3

《巴黎协定》生效 绿色发展成世界潮流

王瑞彬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2015年12月12日,195个国家在法国巴黎召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方大会和《京都议定书》第11次缔约方会议,达成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以下简称《协定》)。与会各方承诺控制并逐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确保至2100年全球平均气温升高不超过工业化前水平以上2℃,并向温升不超过1.5℃的目标努力。

2016年4月22日,《协定》于联合国总部开放供各国签署,175个国家政府代表签字,创国际协定开放首日签署国家数量纪录。当日,中国和美国同时签署《协定》,并于9月3日G20杭州峰会开幕前递交批准文书。中、美分别是世界上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温室气体排放量合计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约40%,两国联手行动有力推动了其他缔约方加速批准程序。10月5日,欧盟向联合国提交关于《协定》的批准文书。至此,《协定》满足了至少55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批准、且其排放量占全球排放总量55%以上的生效条件,11月4日正式生效。

2016年11月7-18日,《协定》生效后首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在摩洛哥马拉喀什召开,核心议题即如何建立有效机制确保落实《协定》。会议通过《马拉喀什行动宣言》,宣称全球已进入气候变化“履约和采取行动的新时代”。

《协定》凝聚了各缔约方在减缓、适应、资金、技术开发与转让、能力建设、行动和支持的透明度、法律形式等应对气候变化传统议题领域达成的新共识,是指引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纲领性文件,是国际气候合

作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成果。在主要缔约方的共同努力下,《协定》达成不满一年即正式生效并进入履约行动阶段,充分显示了国际社会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的坚定意愿和严肃态度。

《协定》再次确认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持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保持平衡的必要性,以缔约方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方案为基础,以控制温升幅度为长期目标,促进各国决策者、企业、投资者树立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将资本投向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领域,整合产业价值链,加速向低碳循环经济转型。在《协定》影响下,各国在清洁能源、能效提高等领域的产品、技术、服务将面临空前发展机遇和激烈竞争,其结果将决定未来较长时期的国际经济力量对比。

《协定》设计了国际合作减排时间表和实施路线图,为各国政府、企业界提供了相对长期、稳定的政策预期。《协定》确定了当前至本世纪后半段约30年跨度的减排时间框架,要求缔约各方在此期间为实现温升控制目标,尽快达到温室气体排放的峰值,以至实现碳的零排放。为此,缔约方“国家自主贡献”方案须每5年修订、更新一次,减排“力度水平”逐步提升,且需“缔约方以国家自主的方式根据本协定的有关规定更新和加强它们的行动和支助,以及加强气候行动的国际合作”。这也为资本持续进入清洁能源领域创造了必要政策条件。在目前189个提交“国家自主贡献”方案的国家中,147个国家制定了发展可再生能源的计划,167个国家有提高能效计划,不少国家还将调整化石能源补贴政策。印度计划到2030年将非化石能源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例提升至

40%，中国、欧盟、巴西等也拟将这一占比提高到20%~33%不等。

近年来，世界可再生能源市场迅速扩张，投资额持续上升。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统计，2015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额达创纪录的2859亿美元。2004-2015年，该领域投资额累计达2.3万亿美元。发展中国家对可再生能源投资额增长迅速，2015年已达1560亿美元，首次超过发达国家。其中，中国、印度、南非等新兴经济体居于领先地位，2015年投资额分别达1029亿美元、102亿美元和45亿美元^①。国际能源署（IEA）基于各国“国家自主贡献”方案目标综合估算，至2030年，为达到方案中所承诺的减排和能效目标，全球须增加投资13.5万亿美元。可以预见，绿色经济发展前景广阔，特别是低碳技术应用广泛的建筑、交通、电力等部门蕴藏丰富机遇。

但也应看到，《协定》出台一年来国际社会环境正在经历深刻变化，不利于落实《协定》的制约因素凸显，各国向低碳循环经济转型的过程不会一帆风顺。

首先，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和增长缓慢不利于缔约方履约。近几年来，全球经济低迷不振，增长率一直徘徊在3%左右，陷入所谓“低增长陷阱”。发达工业化国家复苏动力不足，新兴国家出现系统性风险苗头。据世界银行报告，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仅为2.4%，各国也都普遍下调了增速预期。美国、英国、日本、欧元区等地区经济一度表现尚佳，但已现走弱势头。巴西、俄罗斯、拉美地区等更陷入较为严重的经济衰退。全球贸易疲软和保护主义势头上升、大宗商品行情不佳、金融市场情绪脆弱等因素使得全球经济走势更趋复杂，《协定》缔约方履约意愿受到抑制。

再者，“去全球化”现象加大解决全球性问题的难度。气候变化问题是全球性问题，需要各国政府、企

业、机构等携手合作寻求解决方案，但“去全球化”现象对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形成了不小冲击。英国公投脱欧、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欧洲民粹主义政治势力抬头等事件，造成全球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浪潮涌动。恐怖主义、民族主义、极端宗教势力崛起，都对全球化进程形成威胁。

最后，美国特朗普执政将冲击《协定》及国际气候合作。特朗普就任后或将搁置《协定》，废止美国“国家自主贡献”方案，取消奥巴马签署的部分涉及气候、能源、环境政策的总统行政命令。美国气候政策倒退短期内会对国际气候合作造成负面影响，但不会改变《协定》的生效状态和国际社会落实《协定》的政治意愿。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以来，全球气候治理主导权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国际社会提高了对中国在落实《协定》各项谈判成果上的作用的期待。当前各国履约形势复杂，悲观情绪笼罩，中国自身也面临产业结构调整 and 升级的巨大挑战，但仍主动承担与自身实际能力相符的国际责任，继续实施“国家自主贡献”方案，依照承诺运作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提高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能力，以切实行动增强了各界对《协定》所奠定的国际合作减排“巴黎模式”的信心。发展绿色、低碳经济已是大势所趋，不会因为暂时困难而逆转，其活力及创富效应将持续推动《协定》缔约方之间积极协作，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促进温室气体减排，从而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收稿日期：2017-01-04

编辑：戚永颖

编审：黄佳音

^①UNEP, Global Trends in Renewable Energy Investment 2016[ER/OL], 2016:12, http://fs-unep-centre.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globaltrendsirnrenewableenergyinvestment2016lowres_0.pdf.